

文庫博物館專集（二十九）

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①一文中，我描述和分析了1966年夏天在76所学校中发生的学生对老师的暴力迫害。这场迫害普遍、残酷，而且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曾经发生那样的故事。于是，这篇文章引来了一个疑问：学生怎么可能作出这种大规模打老师甚至打死老师的事情？也就是说，对

迫害性事实的逼近的关注，自然引起了对受迫害者和迫害人者的进一步关注。

本文试图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事实上，回答的方法可能有多种。本文不打算运用现有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理论来作出解释。如同前文一样，笔者首先利用多年来和几百名文革经历者的谈话，其次，参阅当时正式或非正式发表的文字材料，查核和纪录那些未被写出的文革事件。不同于前文的是，本文不仅着重事实的描述，而且更强调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可能对那一时期的总体图景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并对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有进一步的了解。

1966夏天，当学校发生大规模打老师事件的同时，也普遍出现了迫害同学的事情^②。事实上这些学生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妨碍革命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即他们的“家庭出身”。曾被称为“红八月”的1966年夏天的文革运动，并不能笼统称为一代年轻人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的运动。

本文试图回答：部分青年学生遭受歧视和迫害，究竟与当时的打老师事件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在两种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二．发生时间的重合

1966年8月4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在1966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确，即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词未曾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但实际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谈话中。

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其中10人出身于“有问题”的家庭，属于“狗崽子”；有10人来自“革命家庭”，大多为高级干部的孩子，是“红卫兵”成员；另外20多人的家庭属于“不红不黑”，当时填在表格上属于“职员”之类。开斗争会的时候，10名“红卫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这10个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有人动手打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并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混蛋”一词，来自当时贴得到处都是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初二的学生15岁。其中一位挨斗者后来说，这个斗争会对她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一天以后，生活对她来说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同一天里，不仅仅是她的班，这所学校其他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会。

就在同一天，该校的老师也遭到了暴力“斗争”。副校长胡志涛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说：

8月4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见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③

8月4日，这所学校的另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打伤后回到家中，说：“他们打死

一个党员，一个教员，不过像打死一条狗。”她有预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能不到学校去。结果，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打斗了5个校级领导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三位副校长（当时正校长缺）和两位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他们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被带钉子的木棒打、被开水烫、被迫用手抠厕所的脏东西、被罚挑重担子……。这所学校当时有1,600多个学生，虽然参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数已经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卞仲耘老师带着满身伤痕死在学校操场边的学生宿舍楼门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伤。

尽管卞仲耘老师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报告到高层领导人那里，但是未见他们派人或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力杀害。相反，随着文革领导人物及报纸广播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美，暴力迫害继续扩散升级。

卞仲耘老师的死，对她和她的家庭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惨痛伤害，在文革历史上也应是历史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也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暴力杀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后，北京又有一批老师被学生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死者总数至今不详。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甚至被打死。制造、纵容、默许这些无辜者的死亡，是社会道义和良心的大丧失。按照北京市的统计，在1966年8、9两个月中，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卞仲耘老师是1,772人中的第一个。她的死，标志了文革中一个允许用群众暴力来处死人的黑暗时期的开始。

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当时有两首由北京学生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别代表或者说明这两种对象同时所受到的迫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称《嚎歌》^④（见本刊zk9611b），用来强迫老师长唱，强迫他们自我诅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对联歌》^⑤，宣扬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尽管当时的电台并未广播这两首“歌曲”，但是它们却流传全国，甚至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为人熟知。

三．共同的暴力虐待性质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化学教师刘美德一次又一次被打斗。数位当时的学生和老师都讲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头发被剪掉，被逼在地上爬，被逼顶着烈日在学校操场的400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脏东西，等等。而且，刘美德当时怀孕，学生也是知道的。有一天，《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要拍摄这所学校开展文革的照片，因为该校的学生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及其负责人彭小蒙曾经直接得到由毛泽东写于8月1日的一封信^⑥（见本刊zk9609a）的热烈的支持。那天，刘美德被逼爬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学生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踏在她背上，如此摆出姿势，由记者照了下来。这一姿势是仿效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者拍完照片后，这个学生把刘美德一脚踢下桌子。后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由于先天性受伤而死亡。

数位被访者也讲述了这所学校中一些学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学生朱彤，父亲是“右派份子”，他因此被毒打，还被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在窗户外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动物。这所学校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份子”。当班里的“家庭出身好”的男同学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并在那里哀求彭小蒙说：“你见过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万红还是被揪到教室里斗。斗

她的时候，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还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突然把她脚下的凳子抽走，使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在打刘美德老师和打万红同学这两个事件中，有一个相同的细节：故意使她们从高处摔下受伤，显示这完全是一种暴力虐待。施用于教师和施用于学生的暴力虐待性质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教师被打的比例和程度都远高于学生。在我发表的两篇文章⑦中可以看到，在调查所及的76所学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老师是11名，被打死的学生是1名。

这些事件的暴力迫害的性质是如此明显，以至无法用“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来解释其起因。现在有人甚至会怀疑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在处于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怎么可能如此折磨怀孕的女校长呢？又怎么可能如此折磨他们的同班同学？

这种对文革史实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报纸上从未报道这些暴力故事。那时，所有的人都要仔细阅读《人民日报》，但却是当作关于文革的指示而非事实报道来阅读。当时的报纸用慷慨激昂的词语支持“红卫兵小将”的行动，为他们叫好，但并不描写他们具体做了什么。

除了报纸以外，我们还可阅读当时非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写过一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文中说：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

文中的“自来红”是指“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自称“老子”，而把另一部份学生称作“崽子”。从这一类未在当时正式报纸上出现过的词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运用的语言的粗暴性。同时，这篇文章也表现了明确的权力意向。文章说，为了权力，要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以及其“王八羔子”（文中原话）斗。他们也实际这样作了，即不但斗了所谓“牛鬼蛇神”，也斗了他们的孩子。从这样的材料，可能比从正式报纸上较多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时代风尚和真实情景。但是，即使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也难看出本节所描述的折磨刘美德老师和万红同学的事件。

这些暴力虐待事件在当时未被记载。对受虐者来说，记载这样的经历如被发现，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祸，他们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对施虐者来说，他们认为这是“革命行动”，无可非议。当《北京日报》记者拍“再踏上一只脚”的照片的时候，斗人的学生还异常兴奋，说是照片马上就会见报，将此当作莫大荣誉。这张照片后来未被登载。文革结束后，施虐者不愿意提这些事情，受虐者无处诉说这些事情。甚至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也可能会回避这些事实。这不但是因为发现事实相当费功夫，而且因为写出之后还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怎么解释这些暴力虐待？解释事实的难度可能会消灭发现事实的动力。于是，在文革历史被湮没、遗忘、掩盖和浪漫化的同时，文革的暴力虐待性质也在记忆的含混中模糊了。

四．两种暴力迫害的相互助长

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把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改成一座监狱。他们在屋顶上搭了一个岗楼，安装上一盏彻夜长明的大功率电灯。第六中学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和中海只有一街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影响非同小可。当时有不少外校红卫兵前往六中参观学习。

这座监狱存在了一百多天，有9名第六中学的老师从头到尾被关在那里。他们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挨打挨骂，并受到跪煤渣、跪板凳等体罚。有一位老师被打坏了骨头。有一位老师被学生拉来作练拳的活靶子打，以至引起胃出血。一位教导处副主任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放出来一个月后就死了。还有一些人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第六中学的一个老校工徐霏田，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以及一个学生王光华被打死在这个监狱中。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参加这种暴力虐待行动的。有一部份学生甚至像老师一样被关进这座监狱殴打折磨。监狱墙上先就用红色油漆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有一次这所学校高中三年级有两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抓进监狱毒打，血流遍地。打他们的人就用毛笔蘸了他们的血，重描了“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字。

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在文革时又被说成“资本家”。文革前王光华曾经当过班长。文革开始后他曾经批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他未得到红卫兵的批准就到外地“大串连”。1966年9月27日，王光华从外地刚回到北京，就被绑架进学校的监狱。一群同学拿军训用的木枪和桌椅板凳腿毒打他，打得他失去知觉昏厥过去。当天晚上，他被关在监狱中，伤势沉重，气息奄奄。第二天早上，王光华又被毒打。9月28日晚上，王光华死了，时年19岁。

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老师把王光华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据当年抬过王光华尸体的老师说，他们在黑夜中把尸体搬出了监狱小院，又抬着尸体走过六中的校园，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他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一个多月，眼见身受了大量恐怖的事情，那时好像连害怕的心情都不会有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感觉到尸体很重，死去的人的身体似乎比活人的沉重得多。

这些被囚禁在监狱里的老师，目击了学生如何分裂成三个等级。一个等级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他们被歧视，被侮辱，被打，甚至被打死。王光华是其中之一。另一个等级是出身于“不好也不坏”的家庭的学生，他们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组织，只可以参加一个叫“红联军”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的意思是作红卫兵的联合对象。到了1966年11月，“红卫兵”成员都到各地“大串连”去了，在夜里值班看守监狱就成了“红联军”成员的差使。最高等级是“红卫兵”成员。他们掌管狱中人的生杀予夺，还把被关在狱中的老师的工资拿去花掉。有一天，是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前，一个红卫兵在监狱的院子里高声大气地说：“老子他妈的上天安门城楼都上腻了。”原来，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当时简称“西纠”）的主力之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西纠”担任纠察，能上天安门城楼。这样说话方式显露出说话人的骄狂得意，也显示他们当时所享有的相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巨大无比的恩宠。

逼近观察迫害老师和迫害同学这两种同时发生的暴力迫害，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助长的。如上文所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老师成为学生暴力的第一位受难者。但是打死人者并未受到任何惩罚或警告，甚至连批评也没有。当时领导文革的“首长”常到群众集会上讲话。查阅当时编印的各种“首长讲话集”，在这些首长们的讲话记录中，顶多能找到三言两语的对打人情况的极其温和并且间接的劝告，而且从未具体提到老师被打死的事。接着，在北京101中学（8月17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8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8月25日）等学校，老师被学生打死的事件又再发生。在第六中学，十多位老师被关进私设的监狱。9月27日，学生王光华在第六中学的监狱中

被打得失去知觉之后，被关在监狱中的一位女老师上去给他做人工呼吸，也被打断了手臂。第二天王光华继续被打，终于被打死。如果打死老师的事情先受到管束，如果老师的生命当时不那样被视为草芥，那些打死王光华的人可能还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如果他们稍有收敛，王光华或许不至于被打死。对老师的暴力虐待带来了对学生施行暴力虐待的环境。打老师的残酷程度助长了打同学的残酷程度。

另一方面，禁止一部份同学参加当时打老师打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甚至把一部份学生也当作施虐对象，使得从事文革变成了同代人中一种明显而且巨大的特权。这种少数人拥有的特权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不但使这些人感激给予特权的人，而且刺激增长这些人的激烈和疯狂。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红卫兵成员不过占学生的20%左右。但是这部份学生拥有的前所未有的特权使他们控制主导了大局。我们也许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打老师的暴力行动是全体学生可以平等参加的，学生对打老师的兴趣可能不会有那么狂热，另外，学生中的一部份人也可能成为反对派来抵制暴行。而把学生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三个等级的作法，全面压倒在了学生中由于思想或者道德方面的分歧而引起争论及政治观点派别的可能性。同时，严加打击“狗崽子”，也有力地发挥了“杀鸡给猴看”的效应，使得学生中没有人敢于发出制止暴力迫害的不同声音。事实上，在1966年夏天，当一个又一个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曾经站出来反对这种暴行。这是一个令人难过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文革中出现的某些东西，比如“红卫兵”这一名称、打老师的种种手段、学生私设的监狱等等，可能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事先策划的，也就是说，可能是自发地出现的。但是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里，无数人可能发明无数新东西，而这些事情独独能得到文革发动者的支持而风行一时，并不是偶然的。上面的分析说明了打老师和打同学这两件事互相助长的功能，进而也能说明二者是相当整合的。

五．共同后果：暴力迫害的推行与延伸

把1966年的学生打老师以及打同学称为“暴力迫害”，是因为冲突中的双方，一方占有绝对的权力，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关押和殴打另一方，甚至把人打死也没有关系；另一方则只能忍受侮辱和折磨，不能自我辩护，不能自卫，甚至也不能表示投降以保全生命。这样的双边关系，是典型的也是严重的“暴力迫害”范例。

有人可能会说1967年群众组织间的武力冲突导致的死亡比1966年的还多。动用暴力确实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特性，但是1967年的武力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双方互打，可以还手也可以退出的，所以与1966年的暴力迫害有很大区别。打老师和打同学这两类事件则代表了同一个暴力迫害的原则对不同对象的施行。

从1966年6月开始，教育工作者被当作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表示反对当时提出的“教育革命”。在6月和7月“工作组”领导学校文革的时候，工作组领导学生揭发批判老师，尽管在文革以前，老师并无权力来决定教育路线及体制。一些老师被工作组划入“四类”，面临撤职、下放、劳动改造的命运。一些老师不能忍受压力和羞辱而自杀。8月初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迫害升级，变成暴力性的。游街、体罚、剃“阴阳头”、进“劳改队”、唱“嚎歌”、用铜头皮带打等等暴力手段纷纷加诸于老师们头上，尽管他们未作任何反抗。

对于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的大规模的迫害随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的广为传播而兴起。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当1966年8月初这副对联开始流行时，在北京有过辩论，有过不同意见。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提出不同

意见者的人数极少，而且在中国音乐学院礼堂的“辩论会”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在会场上就被打。另外，更重要的是尚能发表不同看法的不是那些首当其冲身受其害的“混蛋”——他们根本已经失去了发言权，除了承认自己是“混蛋”以外，什么都不能说。当受害的一方不能对“对联”做任何批评时，就意味着他们只能接受对他们的或许重一点或许轻一点的虐待，而没有别的选择。至于这种虐待的轻重，全然掌握于他人之手。

暴力迫害并非新东西。但是，由一部份学生大规模地施用于老师和同学身上，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发生于1966年夏天的这一场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迫害，在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红卫兵”组织最早发起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受令离开学校后，有二百多成员的“红卫兵”控制了学校，包括学校的“劳改队”。那时，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迫在胸前佩戴一块黑布，上写“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多次遭毒打。万邦儒被打得肾出血。韩家鳌不得不不断服用专治外伤的“云南白药”。团委书记顾涵芬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化学老师刘树华被斗争后从学校的烟囱顶端跳下身死，时年26岁。

同时，这个学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斗争、被打、被强迫“劳改”。1966年8月26日深夜，当刘树华老师跳烟囱自杀时，高三学生郑光召也正因被毒打而病危。高二学生郭兰蕙的父亲是“右派”份子，她被斗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还有一个初二的女学生卧火车轨道自杀，未死但终身致残。

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普遍建立，这种暴力迫害也在各学校普遍发生，而且，从学校内向学校外发展。从打老师和打同学开始，发展到了打社会上的各种“牛鬼蛇神”。抄家，把“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打人甚至打死人，到处发生。比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红卫兵打斗，以后自杀。从1966年8月26日起，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目从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并且持续到9月2日。9月2日起才降至二位数。在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里，在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了。

这种暴力迫害的打击对象继续扩大，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以外的干部——当时称为“当权派”——头上。这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中的一些人试图保护这些人。在一份1966年8月30日由“北师大女附中、化工学院附中红卫兵”发出的《告工农革干子弟书》^⑧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革命干部的家一律不许抄，凡没经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帮、反革命份子的当权派的家也不应查抄。”“凡没经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帮、反革命的，一律不许体罚、毒打、挂牌、剃头、劳改。”

这张传单的内在逻辑相当值得分析。这张传单反对对“革命干部”施行暴力迫害，但是仅仅是对他们而言的。对“革命干部”不应该抄家或体罚、毒打、挂牌、剃头、劳改，而对别的人并非不可以。事实上，正是红卫兵开始和实施了对很多人的抄家或体罚、毒打、挂牌、剃头、劳改。他们后来只是试图反对施用这样的迫害于某些对象，而不是反对这样的暴力迫害本身。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自己实际上是在沦为由他们开始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迫害的受害者。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从热烈支持早期的红卫兵组织而转向另一些被称为“造反派”的群众组织。“造反派”虽曾部份地批评了红卫兵所为，但是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他们的作法。比如，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当“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和“老红卫兵”（他们后来被冠之以“老”）各占一楼对垒时，有一天，“井冈山”组织中的学生曾用布蒙住万邦儒校长、韩家鳌副校长以及另外三位老师的眼睛，

把五个人驱赶到四层楼顶，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打这五个人。据说这是因为对面楼上的“老红卫兵”骂他们“保守”，他们就以此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性。

这种暴力迫害的原则被贯彻及实施于随后的年月。1966年末和1967年，学生组织的主要指向是“当权派”。在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死。1967年7月，彭德怀元帅在学生举行的斗争会上被打断两根肋骨。

在1966年夏天对老师的暴力迫害的高峰之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教育工作者再次成为主要打击目标。第二次迫害高峰更为组织化、系统化，也持续了更长时间。在本文写到的四所中学的教职员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三人自杀，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第六中学各有一人自杀。也有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比如，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初三学生闻佳，因无家可归以及被强暴而试图自杀，被发现后却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送进监狱，被判刑18年。

上述回顾，可以帮助我们看出文革中暴力迫害发展的轨迹和一些特征。

1. 这场暴力迫害兴起非常迅速而几乎未遇阻挡。1966年7月28日决定从学校撤离“工作组”，8月5日就有老师被打死。到8月下旬，发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9月后每天被打死的人数渐降。从功能角度分析，这种急剧增长、达到高峰后又稍降低的发展曲线，其实际效果之一是人们就此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以及普遍打人所意味的暴力迫害原则。可以设想，如果暴力行为缓慢兴起，大多数人在思想上会不接受，也会有机会说出不同的声音——北京毕竟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城市。但是在1966年8月迅速蔓延的大恐怖中，没有人敢于反抗或者从理论上反对这种迫害。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一定会也被打。随后暴力迫害稍减，人们庆幸生存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

2. 在暴力迫害中发生了超越某些施暴者的意图的情况，即当暴力迫害蔓延并扩大打击对象时，最初的施暴者最终可能变成被施暴的对象。由于这些施暴者先已帮助确立了暴力迫害原则和方式，当其身受其害时，他们也失去了保护自己的道德基础。

3. 在文革的前三年中，占据学校主导地位的势力几经变更，但是暴力迫害原则却一以贯之。这几派势力虽曾互相对立，但是有着相当多的共同思想及行为方式，其中暴力迫害是最重要的一项。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故意把一批又一批的人从社会生活中撕裂出去，“批判”他们，“斗争”他们，“审查”他们，关押他们，摧毁他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活得越不舒服越好。这种方式在文革中不断运用。在一个封闭的大环境中，很多人似乎已经把这种持续的迫害当作生活的自然的一部份。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迫害，我们的了解和研究都还很不够。文革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迫害，始于1966年夏天的打老师和打同学。本文涉及的只是其一角。要对史实做出更全面的描述和更深入的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①此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8月号（见本刊zk9602a1——编注）。

②参看拙文《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中国研究》（香港城市大学），第二期，1996年（见本刊zk9705d——编注）

③胡志涛：《八·五祭》，写于1986年，发表于她和丁丁合作的《生活教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④此歌词曲见注①文中。

⑤此歌词曲见注②文中。

⑥毛泽东的信可见于《“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北京，1988。

⑦见注①及注②文章。

⑧见美国密执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文革传单中。

□ 原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 ∞ ∞ ∞ ∞ ∞ ∞ ∞ ∞ ∞

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 宋永毅 •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尚处于发动阶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共干部子女传出了一副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亮相，宣告了“血统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文革中的诞生。1966年7月至8月初是血统论的流传期。这副对联从北航附中、清华附中等北京中学迅速地流传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主要高校。它非但成为刚诞生的中学红卫兵（后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以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红五类子弟”为核心），而且成为中学红卫兵以“游行”等方式狂呼对联冲击各高校及社会的思想基础。因为这副对联带着过于粗陋和荒谬的封建世袭的思想色彩，并力图把中国社会当时就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公开化与永久化，它一出笼便遭到了大多数学生与人民群众的反对，在中学与高校处处引发了极为广泛而对立的大辩论。尽管它一开始也遭到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温和的劝阻，但经过辩论它却反而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全国，成为风靡一时的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与江青等人，此时正要利用以“血统论”为组织基础的老红卫兵作他们政治斗争的“革命先锋”。如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便公开赞同血统论，他曾在1966年8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①。二是红卫兵的“血统论”作为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来自古籍古人，而是直接来自中共长期以来执行的“唯成份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阶级路线与阶级政策。说穿了，“血统论”不过是一群不懂策略的激进的高干子女，公开地撕下了“重在表现”等等貌似公平的幌子，把同样是浸透了封建权力世袭意识的“党的阶级政策”出了一个水落石出的公开版而已。

1966年6月至7月间，在一篇由红卫兵的创始者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署名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文章公开揭示：“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②换句话说，血统论的中心点是政权，即由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女夺权一掌权。不管老红卫兵的发起者中是否不乏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它的组织路线的血统论则只强调先天的血统高贵。也就是说社会某一部分人的子女可以不通过艰苦的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公平的社会竞争，即制度化地攫取社会权力和财富，成为高踞于广大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至今为止，中国国内流传着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尝试，看来是不无道理的。当时，风靡一时的鼓吹血统论的重要文献还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做顶天立地的人》，北大附中红旗的《烈火捂不住盖子》③，和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十号通令。

1966年8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血统论的推广期。由于

血统论的传播不仅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公开分歧与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毛泽东及文革派的既定目标——打倒一大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这些人则是无法用“血统论”加以区别的。这样，“血统论”成了党中央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保卫自己以及他们派到大、中学的工作组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一方面，他们纷纷组织保卫自己的红卫兵，另一方面，他们挑动一部分群众（红五类子女）去斗争另一部分群众（黑五类及其子女），以转移毛泽东对他们斗争的政治方向。8月12日，高干子弟、北京工业大学文革会副主任谭力夫贴出一张题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④，企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来阐释血统论的合理性，以弥补“对联”的粗陋。同时，又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20日，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一个辩论工作组与阶级路线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一发言的重点一是刻意宣扬血统论，鼓吹学生斗学生，甚至主张对黑七类子女“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二是竭力主张保工作组，把工作组及刘邓派的中共干部受到的批判说成是非红五类子女企图利用文革翻天的证明。由于1966年8月——10月中旬的文革运动已冲击了一大批“血统论”鼓吹者的父母——中共老干部，因而当谭力夫激动地质问反工作组的学生“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的讲话正在重复与阐释着刘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自我保护论，同时在一大批老红卫兵中激起极大的思想共鸣。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在一次普通辩论会上的发言被官方或半官方地翻印张贴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大字报，一时贴遍中国大街小巷。谭力夫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刘邓派干部，为了保护自己与毛泽东的上层政治斗争中不至于被打倒，便利用“血统论”把红卫兵的祸水引向广大无辜的学生、教师与群众。正是在“血统论”的指引下，是红卫兵在北京第一次开了残酷的“红色恐怖”——暴力斗争的先河。仅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天内，据官方材料统计，仅北京市就有1,700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0多名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赶出北京。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有325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血统论”的倡导者们残杀，22户人家被灭门，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血统论”暴露了它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目。

当“血统论”的拥护者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残杀无辜时，毛泽东及文革派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无动于衷，只有当他们看到“血统论”已成为刘邓派干部用以与他们抗争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和工具时，在10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们才声色俱厉地批判了“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⑤（陈伯达）。

至此，“血统论”才从一种占主导性的，为官方默认的社会思潮成为一种为中共文革派批判的异端思潮。

随着“血统论”被批判和群众造反派在“批判资反路线”中的崛起，尤其是随着“血统论”鼓吹者们的父母被一一打倒，血统论进入了它的挣扎期，1966年12月5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红卫兵中的一批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并于1967年1月1日颁发了著名的003通告。在这一通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左倾机会主义”的有益思考，又仍可以看到它组织路线的浓重“血统论”色彩，如这一通告署名的次序——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的干部子弟等级制地排列到“十六省市”的革干子弟。又如同一时期“联动”对其他学生——黑七类子女的恐吓信。《紧急联合通告》，表现出了对文革的严重不满与一些宝贵的思考。例如提出“坚决、彻底、全

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以及“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还未形成斗“走资派”理论前的思想）⑥。

但由于他们所倡导的“血统论”以及耀武扬威的贵族子弟的言行正是最为广大人民所憎恶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突出表现，他们的这些言论只能被人们视为是一种保卫自己父母及自己优越的政治特权的一种本能挣扎。

1967年1月，联动成为中共文革派决意打击的对象，公安部不久逮捕了他们的骨干分子。这使一批“根正苗红”的、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然而，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来自毛泽东的始乱终弃，相反怪罪于反对血统论的其他家庭出身的中学同学。所谓《紧急联合通告》便是最典型一例。通告中讲要借“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们给压下去！”⑥所指，正是戚本禹把《出身论》（遇罗克著，见本刊zk9608a——编注）骂成“反动文章”的讲话，在不遗余力执行血统论上，联动又一次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同流合污。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年文革中也被抓进监狱，下放到工厂、农村，成为原来被他们迫害专政的“黑七类及其子女”的一员，迫害使他们成熟，只是在这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才真正开始跳出个人血统的狭隘背景，思索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并成为民主运动的一员。

①关锋1966年8月在国务院接待室的讲话，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反动思潮》（1970）

②原载北京《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

③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④同注③。

⑤陈伯达《对两个月来文化革命运动的总结》（1966年10月）载《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第302页。

⑥同注③。

□ 转载自《中国之春》1997年第7期

~~~~~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

• 丁 东 •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来重视显在的思想家，而忽视民间的思想家。当代中国显在的思想家，首先是政治家。统治的思想从来是统治者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当然构成了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主潮，值得认真研究。但主潮毕竟不等于历史全部。在研究者纷纷关注主潮的时候，非主潮思想的研究就成为思想史的缺环。对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前期中国民间思想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缺环。

一般来说，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被看作是一段思想史上荒芜的时期。但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六十年代中后期，个人崇拜的狂热达到顶点；七十年代后期，思想解放的春潮席卷神州大地。当中这一段从逻辑上推理也不应当是空白。更何况过来人都知道，实际情况是民间各种思潮曾在坚冰下萌发、涌动。之所以造成一种荒芜感，主要是可供研究的史料比较缺乏。好在近几年，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和编辑出版家，已经开始注意梳理这方面的材料。就我最近读到的有《顾准文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城市季风》、《黄河》和《诗探索》等期刊对“白洋淀诗群”的回忆文章等。还有正在编辑中的《文革书信集》、《今代思想历程》等也搜集了不少那个年代的珍贵思想资料。

当时民间的思想者，多是年轻人。杨东平在《城市季风》是这样描述的：在学校权威、家长权威、社会权威相继失落之后，他们开始了独立的探索，其基本的发展逻辑，是首先在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答案，继而读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再从黑格尔、康德以及其他的西方思想家，并由古典理论深入到二十世纪的现代理论。

前红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是在每年冬天返回北京之时。在众多的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一九七零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的“张木生旋风”。张木生是一九六五年自愿到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接触了当时的现实，他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金星（赵京兴）的《历史哲学》，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

《城市季风》的主题不是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但这种粗略的描述大体上吻合当时的实际，客观上有一种破题的意味。

《诗探索》上宋海泉的回忆文章更富激情：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思想极端禁锢的十年，但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十年。再也没有比黑夜中的闪电那样震耳发聩、那样感动人心、那样长久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了。

黑夜里第一道刺目的光芒是遇罗克。《出身论》第一次宣告了人的政治权力的平等。为此，他惨遭杀害，成为思想解放的第一位殉道者。……其后，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在自己的哲学手稿里，借马克思的口重申了费尔巴哈的命题：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宗教是人的无意识的自我意识”。“人关于神的知识就是关于人自身的知识”。在造神运动达到顶峰的年代，把宗教的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把神降低为人，实际上是把世俗的人提高到神的位置，把对尘世的人的关怀取代对宗教的神的崇拜。……一九六九年夏天，赵京兴的手稿在学生中流传。它标志着已然广泛开展的读书活动已由古典文学领域深入到现代文学领域，进而深入到哲学领域。

这些思想资料中的多数，由于尚未公开出版，所以今天的读者不易见到。好在多数作者都在，搜集、整理不是没有条件。

作为个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思想成果，整理出版得最好的当属《顾准文集》了。虽然文集的问世经历了十来年的波折，作者辞世已经有二十个年头。

七十年代的顾准，与上述思想者不同。他不是一个为理想主义热情所激荡的血气方刚的青年，而是一个饱经沧桑临近生命尽头的老人。他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领导职务，五十年代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历尽折磨。作为具有深厚素养的学者，他的观点不是出自标新立异的冲动，而是出自洞察中外历史的深思。在当时文化专制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氛围里，他之所以能够清醒地发出独立的声音，完全是基于他对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把握。他不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高出常人的一得之见，而是在整体价值观上超越了那个时代。

他的思想精华主要保留在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四年与其弟陈敏之的通信中。在这些书信中，他关于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科学精神与多元主义哲学、一党制与两党制、直接民主与议会政治、愚民政策与无为而治、辩证法与神学等问题的思考，至

今读来仍让人感觉光芒四射。王元化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王元化的评价并非过誉。这些书信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就在亲友中传阅，但在出版过程中却屡屡受阻，直到九十年代才完整地面世。这从另一面证明，他的思想超前又何止于十年！

在文革时期，选择民间方式表达思想的不只是青年人和顾准这样的落难学者，还有张闻天这样曾为中共领袖的老革命家。张闻天当然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正宗的马克思思想在当时也是异端。张闻天自知自己的思想必定为当时的统治所不容，于是让夫人放哨写作，让外甥和侄子用龙眼伪装运出，再由外甥誊抄后销毁原稿。这就是《肇庆文稿》。因为张闻天的生平和思想已经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内，所以本文不再赘言。

当然，以上种种，虽可通称为民间思想，其间的区别也很大。就风格而言，青年人的思想更多不羁的野性的活力，老年人的思想更多严谨与深沉。顾准和张闻天同处生命的暮年，特色也不同。《肇庆文稿》着眼于使国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更富于政治家的气派；顾准的书信则更多学者的气质，更敢于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因而更具有民间色彩。

民间的思想，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年代，实际影响范围当然极其有限。因传播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但思想的价值，并不只是取决于受众的多少，还取决于时间的淘洗和发展的检验。有的思想，风靡一时，日后却成为历史的笑柄；有的思想，在当时鲜为人知，或被视为异端邪说，到后来却大放光彩。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公开的媒体只剩下一种声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往往只能在民间的一隅悄然闪烁。但一部思想史，如果缺了民间这一环，便不再完整。而且，这些艰难产生的民间思想，不只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演进历程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新鲜活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民间，而很少产生于宫廷和庙堂。这本来是思想演进的规律。只是修史为官家所把握，所以，民间的思想往往被忽视，甚至被岁月的风尘所湮没。本文列举的民间思想，不过是那个特殊年代思想精华的一部分。我目力有限，所不及处太多。只想提出这个问题，或许能引起一些同好者研究的兴趣。

□ 原载《读书》一九九五年五月号 熊毅植字

~~~~~

【往事如烟】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插队诗抄之三

• 邢 奇 •

【作者前言：“……诗作大部分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时写的，我从1967年11月至1976年3月在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曾改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除了短时期的伐木、打草、打石头之外纯是放牧，开始时放了一小段牛，后来一直在放羊。”（插队诗抄之二载于zk9710a——编者）】

羊倌之夏

夏牧

夏天放牧时间长，口渴心烦量太阳。
怀里尚余半块饼，一瓶凉水早喝光。

阵雨

晴天饱受日光浴，七月骄阳，无计相回避。
草色发白，不再那样绿。
羊倌和羊，垂首全蔫屁。

忽然卷地湿风起，泼墨蓝天，顷刻无余隙。
雷滚羊咩马喷鼻，
羊倌著急——又没带雨具。

马下躲雨

风带潮湿云带毛，急翻大鞢盖鞍轿。
马下缩身望雨外，鲜明晴日照毡包。

冷雨

冷雨驱羊羊不停，走如流水散如星。
前追渺远拦急进，后拢瘸歪敛剩兵。

雨牧

终日飘风冷雨，羊群奔逃，散入空蒙里。
雨浸衬衣面如洗，纵马圈羊，遍身寒栗起。

狂呼还把鞭举，截住前头，狠抽恨难已。
人生平顺无几许，说与老天，未必便服你。

雷击

马前躲雨在羊边，蓦地轰雷打马鞍。
马死人存落下病，一提此事便痉挛。

连日雨

雷公怒，雨师哭，金蛇狂舞。
日滂沱，夜潇湘，晴霁难卜。
跨骏马，挥长鞭，围追截堵。
为人民，放好羊，风雨无阻。

混群

几群同饮十分危，今日混群又倒霉。
幸好本人先冲断，你来辨认我不亏。

暑气蒸腾

暑气蒸腾倦欲眠，蒙头趴在草中间。
马屁拍出两手血，一天蚊子乱如烟。

烈烈骄阳

烈烈骄阳刺眼疼，如烟如瘴起蚊蠓。
羊群缩紧低头喘，蒙首羊倌困意浓。

蚊

丛丛草，团团雾，蒙著头，挡不住。
蚊虫乱舞羊倌怒。
叮马脸，落马腹，绕羊飞，到日暮。
羊群扎堆难调度。
迎风不停步，顺风就站住。
满腔恼恨无处诉，只把巴掌乱拍骤疼处。

骄阳似火

骄阳似火，不见云一朵。
能屈能伸要数我，且借马影一躲。

草地蚊子真多，坐骑踢腿摇脖。
人在马下正自得，一蹄恰中脑壳。

放羊发现芍药

放羊遥见数花白，策马上坡欲采摘。
跑到近前忽惊异：居然芍药此间开。

夜

天上拖银河，地上山变矧。
山无层次只一抹，抹向星天成暗波。
草原夜，降临了。

夜气千重万重裹，举目朦胧无所得。
却听四面人吆喝，羊倌下夜声相和。
马倌加进几声歌。

大草原上散浩特，重重夜气增间隔。
同在一队守畜群，八方呼唤相应和。
象是分散却连著。

下羊夜（一）

月黑星微，羊群旁，心提胆吊。
下夜人，怕狼来，不敢睡觉。
远近处，狗声鼎沸，手电乱照。
今夜事，难预料。

插杆设防，推车布阵，未必有效。
和衣露宿，细听征兆，时而大叫。
困意虽浓，所幸夜短，急待破晓。

下羊夜（二）

蚊子真多，下夜罪难说。
不断抡鞭人怒喝，
羊群迎风挪，挨打不退缩。

下羊夜（三）

下羊夜（四）

下羊夜（五）

下羊夜（六）

初夏统点羊数

剪羊毛

大羊四腿踢蹬，捆绑初学手生。
插青未谙剪子功，我的妈呀！铰个大眼睛。

数载河边度夏秋，年来秀气黯然收。
啃之又啃伤植被，好草渐稀劣草留。

羊倌之秋

蓝天处处洒秋阳

蓝天处处洒秋阳，草原正变绿为黄。
出羊不等日露头，回羊要到月发光。
一寸光阴一寸金，放羊那怕时间长。
且看今冬弱畜少，自信辛苦不白忙。

回羊（一）

天色已沉羊未回，焦忧出望手搭眉。
模糊白影吆声近，声调悠然正缓归。

回羊（二）

暮色苍苍生晚云，月出正隐半边轮。
信马随羊时侧耳，歌声别有牧归人。

回羊（三）

扯片红云作盖头，夕阳欲去好温柔。
归羊不管闲风景，埋首加餐知己秋。

下夜（一）

包外朦胧一片白，羊群散卧哼声来。
月出秋岭看羊相，个个撑得肚子歪。

下夜（二）

月光如透又如隔，绿绿森森似有魔。
忽起朦胧惆怅感，羊边守夜斜倚车。

下夜（三）

秋月高照，暂宿搬家道。
陶包虽小易拆掉，凑合一夜睡觉。〔注〕

一帮羔子胡闹，蹦上包顶乱跳。
气得羊倌窜出包，抄起棍子当镖。
〔注〕 陶包——蒙语：以蒙古包的顶子支成的包。

秋日飞雪

秋草青青尚未黄，忽然飞雪白茫茫。
亏得地气积温盛，不待天晴雪化光。

放牧寻野蒜

秋天羊肉赛人参，相佐无葱憾煞人。
放牧细心寻野蒜，爆锅一炒真绝伦。

蘑菇圈

一圈绿草特殊浓，圈外白蘑破土生。
轻易与人天不许，才出地面便著虫。

大石满山

大石满山，石上羊撒欢。
已是傍晚闹犹欢，羊倌奔走挥鞭。

顾东难顾西边，羊儿回窜留连。
打滚怪叫把羊圈，羊倌如同疯颠。

深秋冰湖饮羊

湖上冰封去饮羊，拽羊又是一番忙。
几只挤到冰湖上，腰带解开还欠长。

干枝梅

深秋发现干枝梅，惊诧干花无叶陪。
生命旺时未显赫，待成标本始名垂。

※※※※※※※※※※※※※※

羊倌之冬

白毛风

强风掠地雪流波，策马鞭羊如渡河。
阴气蔽天结霭帐，寒光环日带虹泽。

风吹寒

风吹寒，雪暗天，茫茫不见四面山。
羊儿怕风不向前，鞭儿抡圆，马儿大颠。
羊象决堤水，全靠竿把关。
白毛风里是锻炼，不要怨老天。

逆风

雪作白毛满地刮，逆风咫尺似天涯。
此时只想轰羊走，抒发豪情待有暇。

堵堤

白毛风起天凄迷，缩首群羊头更低。
不是长鞭抽得猛，险些又要大决堤。

七九、八九

七九、八九，急坏了羊倌撑坏了狗。
任你搂马任你吼，鞭子抽羊羊不走，
明日圈边添尸首。

雪大百年不常遇，一半羔羊变弱畜。
刨草累羊蹄，归家已无力，
长线穿珠断又续。

回羊（一）

暮雪方飘羊到家，看天深恐夜风刮。
羊儿鱼贯低头走，细碎蹄声透肃杀。

回羊（二）

寒天日落余霞红，入圈羊群不肯宁。
一个山羊墙上走，活脱黑色小精灵。

回羊（三）

雪住风停天色沉，羊盘铲雪抢黄昏。
惊诧邻包忽显近，传声也比平时真。

下羊夜（一）

毡包入夜盖天窗，破洞悄悄进月光。
月光不必来安慰，下夜捐眠乃正常。

下羊夜（二）

风雪掀天羊欲逃，羊倌包外守通宵。
回包烤火忽瞌睡，磕了前额肿起包。

羊（一）

撞出如此砰砰声，顶架山羊不怕疼。
猛地扭身作挺立，俯冲之下决雌雄。

羊（二）

绵羊雪里苦刨食，旁有山羊紧伺之。
待到绵羊辛苦后，伸头一顶又得吃。

风雪牧羊人

山形早白，草色迟青。
十月即飞雪，三月未闻莺。
内蒙草原半年冬，一冬几次白毛风。

朔风掠地横吹雪，人在茫茫雪流中。
啊——
地象风潮流涌的雾海，
山象狰狞出没的云龙。
我啊，赶著羊群，顶著寒风。

雪寒风硬，手僵身冷。
看到羊后退，急得血上涌。
一杆羊鞭抽得猛，圆睁双眼看迷朦。
赶著羊群顶风去，风吹号角壮前行。
啊——
不是叱吒社会的好汉，
不是抗逆潮流的英雄。
我啊，一个牧民，普普通通。

云散风停，人歇羊静。
万支号角息，千里怒潮平。
数重雪山卧晴空，斜阳旁护两短虹。
眺望远处几群羊，仿佛听见有歌声。
啊——
在半年风雪的东乌珠穆沁，
多少人创造著祖国的繁荣。
牧民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

羊倌小照

牧羊（一）

千头攒动我为尊，马上羊鞭得意抡。
好似统兵上阵去，一时自忘是何人。

牧羊（二）

羊像白云下碧天，山头遥控大得闲。
盘膝探取怀中物，且读昨宵未尽篇。

牧羊（三）

地阔天空没有风，放羊闲煞色格腾。
寂寞无人可共语，登山长啸两三声。
〔注〕色格腾——蒙语，知识青年

牧羊（四）

仰看浮云卧看羊，小山顶上白昼长。
云不耐看羊不动，怎生排遣这时光。

牧羊（五）

日作时针天作盘，太阳升落我出还。
插青大半仍无表，测日遂多经验谈。

牧羊（六）

天似穹庐我在中，陋衣蓬发飘西风。
远牧孤独寻四外，手搭眉宇打凉篷。

牧羊（七）

放羊出现额勒咕，掉队离群搞特殊。
轰北往南人冒汗，倒将竿尾狠拨卢。
〔注〕额勒咕——蒙语，转圈。羊患脑包虫病后，
常原地转圈，跟不上群。

牧羊（八）

随羊爬向山之巅，几个山羊争领先。
却恐翻坡有不测，加鞭绕到羊群前。

套羊

丈二桦竿手中操，竿头系上柳木梢。
羊肠套索已拴牢，跨马盼顾意气豪。
看准羊头将套抛，羊群哗啦如退潮。
夹马冲入群中去，千百只羊各奔逃。
左伸右甩皆不中，乱乱纷纷失目标。
东巡西找再发现，羊已逃出几竿遥。
套手恼怒背发潮，拍马探身再抢捞。
眼看伸竿要够著，糟糕！竿头点地折了梢。

羊群旁

上完初中上高中，用了墨水几公升。
如今插队到内蒙，手中钢笔不能扔。

这块地儿宽又平，羊群散作满天星。
绊了马腿坐下来，又把笔帽拧。

平川绿，远山青，羊群白生生，
碧空净，白云停，人在画图中，
色彩多鲜明。

神思涌，笔如风，唰唰唰，赶紧练写景。
正写到，笔滑时，处处有诗情。

哦！北边来了一群羊，
真扫兴，打断了，好心情。
亏得我，勤抬头，只差一条缝儿，
幸好没混群，赶快上马轰。

他妈的，这破马，总是吭吃吭，
节骨眼儿，想偷懒，可不成！

狂呼尖叫，怒发上冲，
挽救了，大混群，这才把气儿松。

哼！竟敢不跟群，差点儿把我坑，
亏得碰上我，要是俩人都胎巴，[注]
那就吹了灯。
擦擦汗，我把它，往北轰，
等那小子来，好好骂一通。

咦！这只羊，脊梁上，三道横，
我们群也有，一模一样，简直不可能。
而且，而且羊数也太少，
大致估计，六百才挂零儿，
莫不是——

赶紧看看羊耳朵，[注]
呦！只只分明，分明是，自己群！
唉！原来是，一直没圈分了半儿，
平白无故地一场惊。
[注] 胎巴——蒙语：撒手不管。
[注] 牧场在羊出生不久，将羊耳剪出记号，
以作为群与群之间的区别。

□ phlxl@gauss.bwh.harvard.edu 推荐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e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李尚靖（美国）	<cm-ee@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张雨田（美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支持：	关蔚禾（美国）	<cnd-info@cnd.org>
	周皓生（加拿大）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ord@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manager@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 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 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149.159.2.6]：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 (WWW): <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